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象性”的四重维度

董思涵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7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9日

摘 要

“对象性”构成了贯穿《1844手稿》的关键概念之一，而且正是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将“对象性”概念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赋予其感性和现实活动的内涵，并在此意义上将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推进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个体与类相统一的现实存在，为后续唯物史观的创立打下了重要的哲学基础。以往学界谈及《1844手稿》的对象性问题，往往将其等同于作为人类本质实现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这不仅片面化了对马克思“对象性”概念的理解，更不利于将马克思《1844手稿》中关于资本主义异化批判及其扬弃的整个思想理路贯穿为统一的整体。纵观整个《1844手稿》，“对象性”这一概念具有“实践”“精神”“社会”“存在”四个维度的内涵。以“对象性”概念之多重内涵为线索，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对《1844手稿》进行整体性理解的框架。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象性，类本质，感性，历史唯物主义

The Four Dimensions of “Objectivit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Sihan D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September 16, 2026; accepted: October 7,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9, 2026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objectivity” (Gegenständlichkeit), constitutes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running through

文章引用: 董思涵.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象性”的四重维度[J]. 哲学进展, 2026, 15(10): 183-190.

DOI: 10.12677/acpp.2026.1510476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ereafter “EPM”). It is precisely in the “EPM” that Marx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 of immanence of consciousness in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endowed the concept with connotations of sensuousness and practical activity, and thereby advanced the human being a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to a real being that unites humanism and naturalism,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pecies, laying an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Previous academic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 of objectivity in the “EPM” often equated it with objective practical activity a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uman essence, which not only offered a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Marx’s concept of “objectivity” but also hindered a unified grasp of the entire line of thought in Marx’s “EPM” concerning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alienation and its supersession. Throughout the “EPM”, the concept of “objectivity” possesses connotation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practice,” “spirit,” “society,” and “being.” Taking the multiple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objectivity” as a clue, a new framework for a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PM” can be constructed.

Key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Objectivity (Gegenständlichkeit), Species-Being, Sensuousnes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马克思《1844 手稿》的理论构建中,“对象性(gegenständlich)”这一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近年来,学界基于《1844 手稿》对马克思对象性思想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了丰富的阐释。例如,张政(2025)结合文献学和哲学史的双重概念路径,深入挖掘了“对象性”具有的主客体对抗与互构的意义,这种对抗与互构在《1844 手稿》中表现为对人类行为与意识结构的描述,而其社会动力机制,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被逐渐揭示为作为阶级斗争[1];张一兵(2021)从巴黎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入手,指出马克思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克服异化的“复归”状态修正为“对象性”本身,从而证明“对象性”构成了异化话语向实践话语转变的逻辑起点[2];王南湜、夏钊(2019)则认为“人是对象性活动”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原则,而作为青年马克思著作的《1844 手稿》则构成了“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一本体论命题的规范性维度[3]。

不难发现,以往学界对《1844 手稿》中“对象性”概念的理解,普遍局限于作为人类能动改造自然、实现类本质的实践活动。然而,马克思对“对象性”概念的使用不仅限于这两个场景,因此,《1844 手稿》中“对象性”概念实际上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如果在对“对象性”概念的研究中忽视这些内涵,可能会对手稿文本的整体性理解造成损害。纵观《1844 手稿》,“对象性”概念具有“作为类本质实现的对象性活动”、“作为理论与审美的对象性认识论”“作为人类社会规范性的相互对象性”、“作为人类存在论基础的感觉活动”四层含义。正如吴晓明所说,“对象性活动”原则(即劳动)构成了整个《1844 手稿》“理论构架的前提和世界观方面的基础”[4],以“对象性”概念为核心、上述四个意义维度为线索,我们可以构建起一个对于《1844 手稿》进行整体性理解的全新框架。

2. 实践之维:作为类本质实现的对象性活动

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与批判,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了对象化或

对象性活动的内涵。正面论证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类本质的规定性：自由而有意识的人类活动，以及将自身对象化地改造自然的活动；而反面论证则是在一种狭化的意义上讨论对象性活动的异化及其社会基础，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进行的对象性活动表现为异化的过程。尽管正面论证和反面论证的论域不同，在他们之中“对象性”概念的含义却是相同的。

2.1. 正面论证：对象性作为人类本质的规定性

在正面论证中，“对象性”在两个意义上构成了类本质的规定性。

第一，人的类特性是把自身当作对象的能力，即自我意识。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将抽象的自我当作对象，还将经验的即行动的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因此人的类特性还体现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生命活动施加反思，使得其体现自身的目的和意志，从而超越直接的自然必然性。所谓的人把自身当作对象，其实就是说人具有自我意识。马克思关于人类自我对象性结构的观点显然承袭自黑格尔哲学，并融入了赫斯行动哲学中对现实生命活动的关注。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的形成意味着人在异己的对象中发现自身，从而促使意识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意识发现自己本身是对象的本质性东西，使自己离开对象而映现到自己本身中，对自己本身成为对象性的。”^[5]而对象性的结构正是自我意识走向普遍性，同时也是绝对精神现实化的本体论基础，因为精神的辩证运动正是将对象化和将对象不断收回到自身之内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对象性同时也意味着普遍性的实现过程。理解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结构，我们就能完全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说人对象化自身的过程是人走向普遍和自由的生存的过程，为什么自觉的活动同时也是自由的活动。

第二，人的类本质的现实化，即对象性的活动，是类本质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环节。这一层含义不仅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性”概念的内涵，更是马克思本人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对象性”体现为人将自然界视作自己的对象，不仅将自然视作自己“无机的身体”，更能动地将自然改造为自己作品和现实，从而在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类本质。这一点同样承袭自黑格尔的对象性概念。在黑格尔那里，精神在自身之内设定自我现实化的环节，这些环节就是精神对象化自身的过程，是精神最终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黑格尔的精神对象性活动是为了最终收回自身，对象化是应当被扬弃的环节；然而，马克思认为，本质力量的活动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只有对象性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物，而将对象收回自身的自我意识，只能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人类实践，即人与其改造自然的产物处于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状态，成为了现实的人自我实现的哲学原则。

2.2. 反面论证：对象化堕落为异化的现实表征

在反面论证中，马克思分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本应表现为人类本质实现活动的劳动遭遇异化的过程。由于工人劳动的产物，即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不属于工人自身而属于非工人，也就是资本家(第一规定)，工人的劳动过程，即生产商品的对象性的活动本身，必然也从属于资本家(第二规定)。劳动的产物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由此社会逐渐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即阶级对立(第四规定—私有财产)。在上文正面论证中“对象性”概念的双重维度的意义上，异化劳动的第一、二、四规定性可以统一为对象性活动的无法现实化：工人无法在自己的改造自然活动中、体现自然、直观自身、发展自身。由如此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活动形成的改造自然的产物，只能是具有异化本质的私有财产。而第三规定，即表现为类生活和肉体生活之目的与手段颠倒的类本质异化，则体现了人自我对象化这一类能力的错用：工人的自我对象化不再意味着将自身行动对象化出来，以使行动成为自我意志规定的自由实践，而是意味着将自身对象化为用来出卖和换取生存资料的劳动力，以使行动成为受

他在(资本)与自然必然性双重规定的异化劳动。至此,我们发现在反面论证中,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是与对象性在类本质中的双重规定性(正面论证)相对应的。

如果说马克思将人的对象性活动作为哲学原则的尝试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那么《1844手稿》中对工业和世界历史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分析,则表明马克思准确地找到了人类对象性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实例和研究对象,距离广义唯物史观[6]更近了一步。对于工业和世界历史的关注与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对象性”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跨越:超越了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象性活动概念,开始涉足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基础的人类作为集体的对象性活动——这已经非常接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概念[7]。然而,此时的马克思对工业的理解还没有完全脱离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窠臼,他将工业视作“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5];他将世界历史视作“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在这里,工业和世界历史仅代表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而没有形成切中社会历史的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3. 精神之维:作为理论与审美的对象性认识论

以往学界为强调马克思巴黎时期对黑格尔哲学的自觉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大多在“对象性”问题上强调其活动原则和实践维度,然而仅就《1844手稿》而言,理论研究、审美创造等精神上的对象性活动也是马克思关注的内容,而这一研究理路直到近年才通过马哲与美学的交叉研究而得到重视[8]。

体现为审美与理论的精神活动实际上并不违背实践原则,因为在《1844手稿》中,作为对象性活动的精神并不同于思辨哲学中作为本体的抽象精神,或“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而是经验的、现实的脑力劳动;也不同于对于自然与社会存在的简单直观,例如非工人(资本家)对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态度,而是一种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创造性的认识论活动。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在精神层面成为人自然科学与艺术创造的对象。人不但可以通过现实的劳动赋予自然界以主体本质,还可以通过观察、总结创造理解自然的数学形式,赋予自然审美的合目的性,质言之,赋予自然界在意识中的表象以主体性。

这种意识中进行的对象性已经具备唯物主义的哲学原则,因此与康德式的先天认识论有着本质区别,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在理论认识活动中,认识的形式是历史性的。马克思在对自然科学的分析中强调,科学需要从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在人类主体性活动中生成的历史是自然科学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密不可分的[5]。这说明完全独立于人的具有绝对客观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人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不仅要以人的生存需要为出发点和目的,更在其研究过程中受到人的感性的影响。而人的感性,就其在特定社会中的生存而言,是具有历史性的。对于自然科学或认识论中历史性原则的强调,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但这一思想传统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并由他们发展为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意识,例如卢卡奇[9]、索恩-雷特尔[10]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康德主义的先天认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将唯心主义认识论形式的先天性扭转为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对个体认识能力的塑造。第二,在审美活动中,美的规律直接体现为现实的作品、艺术的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11]。人类不只懂得被动地接受现成的自然之美,还懂得按照美的原则、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后者才是马克思想要强调的作为审美的精神对象性活动的内涵。

4. 社会之维:作为人类社会规范性的相互对象性

“对象性”概念的前两个维度,强调的是在对象塑造即改造自然方面的主体性。然而,马克思承继黑格尔的“主体-实体”辩证法原则,认为对象性应当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存在物如

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5]。因此，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在对象性活动中应当同时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两个原则，即他的对象性的活动应当同时也表明自己也是对象，从而保证与对象保持对象性关系，而不致如绝对精神那般将对象性关系置于主体自我认识、自我创造的深渊。这种相互对象性构成了马克思构建社会关系理论的基础[12]，因此，作为相互关系的对象性就体现为人类社会关系的两个原则：第一，对人与人(即作为个体的人，“小写的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即人与他者的关系双方作为平等的对象处于类的关系中；第二，人对与社会(即作为集体的人，“大写的人”)的关系而言，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就其本性而言内在地具有社会性，“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

4.1. 第一个原则：与“小写的人”的关系

就第一个原则而言，马克思以两性关系这一实例来说明合乎人本性的社会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评中，马克思指出，由于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两性关系，因此，人在面对这种自然关系时的处理方式，可以直接地体现出人的作为类的本性，他的类本质的实现程度。马克思做出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人就其本性而言具有自然和类的两种规定性，而人的自然的规定和人的类的规定在合乎人的本性的意义上应当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之间的桥梁就是“感性”[5]——感性作为人的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在自然和类特性相统一的意义上，人在其自然中体现其类特性的程度，体现出人的类本质的完善程度。所以，马克思从两性关系这一自然关系入手，研究合乎人性的作为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两性关系中，应当将异性的个体当作人，也即当作和自己一样的对象来对待，这样那个异性的个体在主体这里才不致降格和物化为具有有用性的某些特性，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与主体之间产生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主体间性。

不难发现，虽然马克思在两性关系的论述中没有直接提出“对象性”一词，但是其对两性关系的规范性描述却符合我们在本节开头所述的相互对象性原则：作为对象性存在的人一方面要在对象性活动中保有一个外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同时证明自己同时也是在这个对象性关系中的一个对象，因此他的对象性活动应当受到就它的种而言的普遍性原则的支配。具体到两性关系中，只有两性关系平等化，人的性生活才不再是纯粹的泄欲活动，而是自由而自觉的、具有相互对象性的类生活[13]。

马克思认为，自然与类的关系是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缩影和起点，因为社会关系无非是一种对他人的需要，也即对象化他人的活动，而性只是需要的一种形式。由此，马克思在后文中将相互对象性的关系从与异性的关系，扩展到与广义的社会交往对象的关系，再扩展到与作为人类集体的“大写的人”的关系。

4.2. 第二个原则：与“大写的人”的关系

就第二个原则(与“大写的人”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展开了十分丰富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真正的共产主义”小节。马克思关于人与作为集体概念的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社会性是人性的必然组成部分，具体表现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对象。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抽象地谈论“社会”与“人”的概念，而是以人与社会相统一的现实媒介——劳动产品的归属与使用，具体地说明了人与社会相统一的表征，而这一点与贯穿《1844手稿》的私有财产视域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认为，对合乎人性的、社会的人来说，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自为存在)同时也是为他存在，即为社会所共有的存在，即便个人在从事并不与他人直接相关联的活动，他也是作为社会的人在活动的。可见，马克思在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已经超越了人类个体之间直接交往的范畴，上升到让“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被“看见”的理论高度，又通过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社会化的劳

动产品这一中介,摆脱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概念游戏,进行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唯物主义化的一次有益尝试。

第二,社会性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即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质言之,使得人在自然中的对象性活动合乎其类本质。在上面的第一点中,笔者已经指出,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社会之间的统一关系时是从劳动产品的归属与使用形式入手的,而根据笔者在“实践之维”中的论述,劳动产品无非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因此,马克思在这个层次的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中,引入了“自然”这一因素,说明社会构成了人的类活动——合目的地改造自然的必然媒介,因此,只有作为社会的人、社会性的人,才能做到改造自然、实现其类本质。马克思认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社会性的人作为一个集体从事的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得到最终实现,实现人与自然界统一、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自然也同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反之,如果人的社会性本质遭遇异化,即处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中,那么一方面,人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表现为异化劳动,另一方面,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即生产活动成为人与人之间对抗性关系的来源。

第三,人与作为“大写的人”的社会本身就存在着相互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5]”在这种特殊的对象性关系中,社会并不作为如人化自然那般具体地外在于人的对象而出现,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前反思的人类活动于其中的结构,规定着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形式,也就规定着人类本质实现的程度。这一主体与结构、个人与历史之间“剧中人”和“剧作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后来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例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7]。当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实施对象性活动时,它也创造着特定的社会,而这种创造恰恰又是在某些特定社会关系的规定下进行的,尽管人们对这一点往往是无意识的。因此,虽然这层含义在《1844手稿》的文本中仅仅表现为一句话,但由于其开启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由人与社会关系的上述这三层含义,我们可以看出,“对象性”概念仍然在之中发挥着构架作用:在第一个原则中,人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的分配形式,构成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媒介;在第二个原则中,社会本身构成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媒介,在这个意义上补充了“实践之维”中作为人类本质的对象性活动得以现实化的条件;在第三个原则中,人与社会本身构成了相互对象性的关系。

5. 存在之维:作为人类存在论基础的感觉活动

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的“感性”小节全面论述了人类感性的特征。总的来看,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感性更多是感觉,即感官活动的意义,而非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的作为感性活动的人类能动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感觉是对有生命的感性存在物最无可辩驳的证明,“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质”[5]。感觉不仅指涉五官感觉、精神感觉与实践感觉,还在感觉实践结构的演变中映射着人的生存发展的历史[14]。在这个意义上,感觉可被视作马克思对人存在论基础的一种建构。

对“感性”小节中马克思对感觉特性观点的总结与分析,在学界已有丰富的论述[15]。总结而言,马克思认为人的感觉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全面性。马克思指出,感官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个体的一切器官,……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5]。人对于对象以及他整个生命的把握,应当使得自己的感官的对象性活动得到全面、丰富、深刻的发挥,而不仅仅只把握到物的利己主义性质或有用性。只有这样,感官才能是真正属于人的,而不是因私有财产的渐染而与人的本性存在异化,成为片面、贫瘠、仅体现为占有和拥

有的“伪感觉”。在[私有财产和需要]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和具体地指出这种“伪感觉”的社会表现：对于货币需要的无限增长。因此，与表现为丰富和全面的真正的感觉相对，“伪感觉”就指的是堕落到纯粹占有的欲望的感觉。

第二，社会性与独特性的统一。感觉的全面和丰富性是以社会性作为基础的，因为只有超越纯粹主观性的社会的感觉，才能获得最大的丰富性和最极致的享受；而感觉的社会性又是以人与社会的统一，即社会性复归人的本性作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不表现为私人的占有，而表现为社会的共享，单个人对于对象的感觉才能呈现为社会性的。感觉的社会性并不意味着感觉的同质性，每一种感官、每一个个体，都在独特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中肯定自己。

第三，能动性受动性的统一。能动性主要体现为感觉的主体本质，人的感官的本质力量规定了对象具有的意义。而受动性则体现为，人的感觉受制于对象，对象世界为人的感官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了前提。总之，感官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得以成立、对象性活动能够完成，“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5]。在这一特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感觉符合在第三节“社会之维”中提出的“相互对象性”的定义。

第四，世界历史性。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小节“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是人通过劳动(即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感觉的世界历史性也同样意味着合乎人性的感觉通过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说道，为使人的感觉复归为人的，“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5]。因此，丰富的合乎人性的感觉需要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因为只有扬弃了私有财产、也就扬弃了异化劳动的前提下，人的本质才能够以对象性的形式展开，人的感官的对象性的活动才能合乎其本质力量地开展。

不难发现，上述四条马克思关于感性特性的论述，都是围绕着“对象性”概念进行的。这体现出，在马克思对人的活动和人的存在的规定方面，对象性的原则都是一以贯之的。

6. 结论

在本文中，笔者充分挖掘了《1844手稿》中“对象性”概念的内涵，分别挖掘出合目的地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在理论和审美上对自然的对象性认识论，以及以相互对象性为原则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以感官对象性活动为代表的人类存在论基础四个维度的内涵，弥补了学界通常将手稿中的“对象性”概念仅理解为改造自然、实现类本质活动的理论缺憾。然而，笔者并未言尽于此。许多学者，如秦菲[16]、杜利英[17]等曾指出，对于《1844手稿》的整体性研究可以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因此，笔者的工作也可以为对《1844手稿》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路。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象性的这四个维度的内涵，相对完整地串联起整个手稿的文本，以文本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吴晓明老师曾在著作中指出的，“对象性”概念是整个《1844手稿》的哲学原则的初步论断。

参考文献

- [1] 张政. 重思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5, (04): 83-90.
- [2] 张一兵. 否定辩证法: 探寻主体外化、对象性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解读[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8): 52-77, 205.
- [3] 王南湜, 夏钊. 人是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之第一原理[J]. 天津社会科学, 2019(1): 13-28.
- [4] 吴晓明.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 [5] 黑格尔. 精神哲学: 哲学全书·第三部分[M]. 杨祖陶,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6] 张一兵. 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经济学语境——《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解读[J]. 学术月刊, 2022, 54(6):

- 5-9, 26.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朱立元. 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 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问题[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9]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0] 索恩-雷特尔.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M]. 谢永康,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1] 张群. 马克思“劳动生产了美”的感性逻辑及其审美叙事——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考察[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 91-97.
 - [12] 魏小萍. 从双重对象性关系中解读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 5-12.
 - [13] 聂昕怡. 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两性关系二元属性——兼驳西方女权主义者的“两性关系自然说”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3): 10-15.
 - [14] 鲍金, 黄婧. 感觉的存在论建构及其当代效应: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新解读[J]. 社会科学, 2025(5): 25-33.
 - [15] 李彬彬.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重新思考“巴黎手稿”对共产主义的七条论证[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3(3): 138-145.
 - [16] 秦菲, 苗向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体性问题研究[J]. 人民论坛, 2014(32): 176-178.
 - [17] 杜利英.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本质溯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读[J]. 求索, 2019(5): 88-94.